

王伯祥：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说好

本报记者刘荒、黄海波

走进亚洲最大的菜市场——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，南来北往的客商已经很少知道王伯祥，毕竟他离任寿光县委书记已经28年。但这并不妨碍他的“政绩”，成为改革开放40年标志性的成就之一。

2018年12月18日，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，作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，王伯祥荣获改革先锋称号。

抓蔬菜市场建设，抓蔬菜大棚推广，抓寿光开发壮大工业企业……在很多寿光人心中，一副农民模样的王伯祥，还是一位算大账算长远账的县委书记。

司机找书记算账，催生出现亚洲最大的菜市场

年逾古稀的王伯祥，清瘦，看上去不苟言笑。1986年5月，王伯祥担任山东省寿光县县委书记。他清楚地记得前任县委书记李汉三调任潍坊市人大前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要撑起寿光这个家。”

拿什么撑起寿光的未来呢？王伯祥想到的还是抓蔬菜流通。

寿光有悠久的农业历史，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便诞生于此。尤其是寿光南部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，适合蔬菜种植。清康熙年间，寿光就有40个蔬菜品种。即便在以粮为纲的年代，寿光人也没丢掉老本行。

田间没有连接市场，寿光人很早就体会到了菜贱伤农的苦涩。1983年，刚刚解决温饱的寿光南部农民，因为单一种植大白菜，结果导致两万五千吨大白菜滞销，只能任其烂在田间地头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，下班路上从一位哭泣的农民手中买下一整车白菜，一家人吃了整整一个冬天。

寿光北部有一条马路通往胜利油田。背靠这个30万人的大型国有油田，零星的蔬菜市场就在马路两侧自发形成。

“露天设摊卖菜，路就堵上了，司机到了这里就骂领导，骂县委书记。”王伯祥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，庆幸当时并没有简单地以交通执法为由，取缔这些路边市场，否则就扼杀了寿光的发展。

为了治堵，也为了给寿光蔬菜寻找出路，1984年8月，在王伯祥的主持下，占地20亩的蔬菜批发市场在一个叫九巷村的地方建成了。

当时的寿光，经销蔬菜要靠国营公司。“实事求是地讲，要牵扯到姓社姓资的问题，抓市场就必然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。”王伯祥回忆说。

在新生的市场，老实巴交的寿光农民，推着一辆小车就能换回一沓钞票，多到能让他们幸福地点上几遍。人流不断涌向九巷，占地20亩的菜市人满为患。

硬化地面，铺设管道，搭建交易大棚，招收记账员、服务员、经纪人……刚刚担任县委书记两个月的王伯祥，动员全县万名干部职工参与蔬菜市场扩建。第二年，九巷蔬菜市场面积扩大至150亩，交易额达到了1.5亿元。

王伯祥还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了“三个百分之七十”的号召：每个部门、每个单位，要拿出百分之七十的人力、百分之七十的时间，每个人



▲王伯祥（左二）当年向农民了解情况（资料照片）。 新华社发

拿出百分之七十的精力，参与蔬菜大流通。

举全县人脉资源建设的批发市场，先后与20多个省区市的850多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，建立起稳定的销售关系。

1988年，我国开始实施“菜篮子工程”，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吃上新鲜蔬菜，并提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。彼时的王伯祥，已经带着供销人员，将寿光菜卖到了北京人民的菜篮子里。

到了1991年，九巷蔬菜市场占地达到了600亩。与之相适应，一个四通八达的蔬菜购销网络初步形成。东北的土豆、甘肃的洋葱、江浙的莲藕……寿光人把蔬菜生意做到了“买全国卖全国”。

2009年，脱胎于九巷蔬菜市场的寿光农产品物流园投入使用。如今，行走在这个面积超过280多个足球场，日成交量两万吨的地方，能真切感受到亚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气势。

帮菜农算明白账，“长江以北就在这17个大棚”

谈起老书记王伯祥，寿光“蔬菜大王”王乐义有说不完的话。言到动情处，老人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什么叫担当，这就叫担当！”

同为寿光“蔬菜革命”的关键人物，两人的友谊超过了半个世纪，至今惺惺相惜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和广大农村一样，寿光农民吃饱了饭，但是兜里没钱。在寿光县三元朱村，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，正在为村民致富发愁。

村里种过果树，办过食品加工厂，村民嫌来钱慢，不解渴。

解放以前，村里有人当兵去了台湾，脑子活络的王乐义想到了海外关系。“刚一接触，对方就说当年就是大头兵，到了台湾之后也没搞生意。”王乐义笑着说，这也指望不上。

几经探索，王乐义把目光投向了蔬菜大棚。夏天是草，冬天是宝，种了多年蔬菜的寿光人，自己冬天吃菜都只能靠贮藏。

那时的三元朱村已经建了几个蔬菜大棚，只是冬天需要在棚里生炉子，而且只能种叶子菜，种不出黄瓜西红柿等果菜。

为了改良大棚技术，从1986年开始，王乐义带着村民数次外出学习。

在北京四季青，他们见到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温室大棚，但是每平方米一万元的造价，让这些山东农民面面相觑。

王乐义记得一名保安曾对他说，建设大棚的日本专家，晚上还要回日本睡觉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韩永山的名字和山东寿光联系起来了一起。

说来也巧，王乐义的堂弟王新民是经营蔬菜的专业户。他在大连结识了韩永山。这位辽东农民通过参阅国外农技书籍，搞出了冬天不生炉子的冬季暖式大棚，并且通过嫁接技术在里面种出了黄瓜。

看到王新民拿着从韩永山大棚里摘下的黄瓜，王乐义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。怀着巨大的诚意，王乐义将一身是宝的韩永山请到了三元朱村，担任冬季暖式大棚的技术指导。

已经退休的农业干部信俊仁，当时是三元朱村的驻点干部，“韩永山就住在三元朱村的村部，村里怕他住不惯，特意买了稀罕的席梦思。”

三元朱村开始筹建冬季暖式大棚，可是建一个大棚需要五六千元，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，干不好怎么办？

关键时刻，一直关注大棚进展的王伯祥找到了王乐义。

王伯祥鼓励王乐义，搞试验要么成功要么失败，成功很好，不成功总结经验再搞，“有什么事情我顶着”。

这一年，三元朱村17名党员，一人“认领”

了一个大棚。

1989年8月间，17个新式大棚出现在了齐鲁大地上。年前收了一茬，年后又收了一茬，刨去大棚建设费，一年收入两万多元。

当水嫩嫩的大棚黄瓜上市时，大家对价格举棋不定。有人说2元，有人说3元。王乐义也想了下说，卖到5元就了不得了。

在农民眼中很懂经济的县委书记王伯祥则豪气地说，“长江以北就你们这17个大棚，依我看，低于10元一斤就不卖……”

有了县委书记帮忙算账，三元朱村信心高涨。

一个三元朱村还不够。当时全县938个村，仅有四个村的存款超过一万元，而三元朱村凭借暖式大棚，收入突破百万元。

王伯祥已经想好大干一场。他组织万人大会，号召到三元朱村学习；让王乐义参加县委常委委员会，研究暖式大棚向全县推广；成立领导小组，组长由王伯祥亲自担任，另外再配两个副县长，保证足够的领导力量；成立和局长一个级别的蔬菜办公室，除了沿海几个乡镇，其余27个乡镇全部搞试点……

王伯祥还聘请韩永山担任蔬菜办公室顾问，这让自认没有文化的老韩非常忐忑。

据韩永山的爱人周万珍回忆，王伯祥对老韩说，不要你的文化，只要你的技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很多农民拿不出钱建大棚，王伯祥承诺每个大棚县里补助2000元，按时到位。然后，他亲自跑到银行要贷款。

县委书记找到银行行长，开口就要2000万。因为数目太大，这位行长很为难，要是放出去，谁又能担保全部收回呢？

“我担保行不行？我这个县委书记就不值2000万？”王伯祥问。

1990年，寿光一口气建成了5000多个冬季暖式大棚，除了个别因为火灾“夭折”，其余全部成功。

寿光蔬菜，开始由量向质转变。

算清共同富裕账，寿光不能“半身不遂”

由于想念家人，韩永山产生了返乡的念头。为了留住人才，王伯祥组织召开常委会，决定奖励韩永山现金5万元，50多平方米楼房一套，全家四口迁到寿光“农转非”。

这是一个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美谈。要知道，王伯祥当时的月工资才107元，11个县委常委中，9个人的配偶都是农村户口。

而当有人提议建一个高档办公楼，改善一下办公条件，或者在全县一万眼机井上加盖机井房，迎接全国水利会议……王伯祥都给怼了回去。

“我们是为多数人干的，不是为少数人看的。”熟悉王伯祥的人知道，这个一副农民模样的县委书记，讨厌往脸上抹粉。

善于替群众算细账的王伯祥，在全县算的是共同富裕的大账。

寿光北临渤海，南抵青州，东衔寒亭，西接广饶。一条弥河穿县而过，将寿光分为南北两块：寿南湿润，土地肥沃，被誉为“昌潍粮仓”；寿北则是120万亩的盐碱地，开发寿北在当时是老大的问题。

“南部逐渐富了，北边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？”王伯祥不止一次地说，寿光不能“半身不遂”。

1987年，寿光成立寿北开发规划组，300多名水利、养虾、晒盐方面的技术人员，经过8个月调研完成了可行性规划。

包产到户若干年后，寿光依然组织起了20万人的建设队伍，浩浩荡荡开进寿北的盐碱地。

信俊仁参与了这场从1987年10月开始的大会战：天还没亮，汽车、推土机、拖拉机、马车、小推车，就排满了道路。20万民工扛着工具，潮水般涌向盐碱地。

王伯祥和其他建设者一样，住在工地的窝棚里。县委11名常委中有9名刚好也在工地，常委会索性就在窝棚里召开。

长达45天的大会战，在寿北盐碱滩涂上开发出了15万亩虾池，20万亩盐田，60万亩棉田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国家紧缩银根，很多企业面临贷款难。为了让工业企业快速成长，善于算账的王伯祥把财政局局长田效忠请到了办公室：“我要把全县的工业税收全免了。”

财政局长吃了一惊，全县两万多吃财政饭的嘴巴怎么安排？王伯祥一点一滴给他算，老田的眉头才逐渐舒展。

1986年，寿光全县财政收入1亿元，其中盐业税占到六成，工业税仅仅1500万元。增加一点盐税，就能把免收工业税后的窟窿补上。

王伯祥把主管盐业的副县长、盐业公司总经理和税务局长叫在一起，再加上田效忠，“四人小组”南下西进推销寿光盐。

作为“放水养鱼”故事的重要人物之一，田效忠常说，他（王伯祥）脑袋里有钱。

“这可是我们当年发展工业的秘密武器，一般人不会问，我也不会说。”当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了这个“秘密武器”后，老人居然露出一丝慧黠的微笑。

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，陆续有记者过来采访，希望从这位75岁的老人身上，找到40年发展历程的注脚。

“当年在寿光建蔬菜市场，推广蔬菜大棚，遇到阻力怎么办？”记者问。

“当时寿光发展蔬菜产业，上级也有不同意见，说还吃不吃饭了？我们县委也不听这一套。”王伯祥语气肯定地说。

这位县委书记甚至坦言，“担当”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鲜词汇。他履职的那个年代，没有所谓的干部免责条款，也不用出台文件激发干部的状态。他理解的担当，就是时时刻刻把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，“要看大方向，有的干部作风简单一些，只要大方向正确，就要鼓励他。”

为民生算大账的王伯祥，对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很少顾及。1991年，他升任潍坊市副市长，搬家时有一套补了差价的电冰箱，一张桐木床，几把旧座椅，还有几个塞满被褥的纸箱子，只用了一辆小货车就搬得干干净净。

心直口快敢做敢当的王伯祥，难免得罪人。在寿光期间，曾有部分村民被人鼓动，联名给上级写信，质疑他建设蔬菜市场的合法性，投诉拆迁补贴不到位。

上级部门做了深入调查后发现，寿光走的是一条致富群众的好路子，但是群众工作还要做深做细……

面对“插曲”，王伯祥曾坦言：“没有想让大家都说好。”

尤垂镇：富民快车道轻易不踩急刹车

本报记者刘荒、李坤景

48岁那一年，尤垂镇站在了决定晋江命运的历史关口。1985年9月，他从福建省德化县调任晋江县委任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，负责处理震惊全国的“晋江假药案”。

当时，不论是尤垂镇还是晋江老百姓都想象不到，十七年后，晋江人爱拼敢赢的奋斗历程被提炼出鼎鼎大名的“晋江经验”。

1985年的夏秋之交，晋江人心惶惶：“晋江假药案”到底要处理多少人？乡镇企业还能不能办下去？晋江的路该怎么走？

在改革开放迎来的第40个年头，年逾81岁的尤垂镇在泉州的寓所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采访。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，身体依然硬朗的老人始终面带微笑。他的举止修养让人如沐春风。只有深刻了解那段历史，才能体会老人当年的抉择和作为，承担了多大的风险，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。

回首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，尤垂镇最欣慰的是，即使晋江在发展的快车道上遭遇磕磕绊绊，始终没踩急刹车，没走回头路。

受命“除虫护花”

晋江的改革开放从农民洗脚上岸起步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晋江农民利用侨乡“闲人”和侨眷“闲房、闲钱”等优势，纷纷创办联户集资的乡镇企业。

在“晋江假药案”爆发前一年，晋江还是改革开放的模范标兵。1984年3月8日，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《福建一枝花——记晋江陈埭公社农民集资办企业》并附有署名短评《陈埭的启示》，高度评价当地联户集资办厂的做法。1984年晋江县陈埭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，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。

然而，昨天还在扶犁禾锄的农民，没有多少积累冲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浮，难免会走一段弯路。

1985年6月16日，人民日报发表消息《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》——晋江当地个别联户



▲2018年，尤垂镇（左）在福建泉州的寓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 姚煜娟摄

食品厂以冰糖银耳等制成快速食品，加上卫检编号作为保健品销售，企图在公费医疗中通过处方方给病人，以扩大销路——引起福建省委、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

在被禁锢的思想刚刚解冻的年代，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未统一，现在看来可以由法律解决的案件在当时是“天大的事”。不久，中央和福建省的工作组先后进驻晋江。“晋江假药案”一时间让整个晋江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。

机器停转，工厂关门，刚刚显得生龙活虎的乡镇企业没有了生气。在全国舆论的声讨下，晋江的

改革发展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。

尤垂镇就在这个时候受命主持晋江工作。这次任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福建省主要领导对“晋江假药案”的态度。

1982年，尤垂镇被调往仓苍公社当书记。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生活困难，尤垂镇召开了仓苍公社的扩干会。会上，他指出“中央文件已明确要发展商品生产”，老百姓办工厂就是生产商品；中央文件也明确流通要搞活，搞供销、推销是搞活流通”，并号召“发动千家万户办工厂”。

仓苍的水龙头工厂很快办起来了。但1983

年，一家中央媒体刊登了一封大连读者来信，说福建南安仓苍水龙头质量低劣，欺骗消费者，甚至提高到“一个小小的仓苍要搞乱全国”的高度。

1983年全国正开展“严打”。买空卖空，制假贩假，都是打击对象。为避免辛苦建起来的工厂夭折，尤垂镇派村支书重新购买上好的水龙头上门更换，赔礼道歉。他在公社召开大会，提出“以质量求生存，以信誉求发展”，继续发动群众办工厂。

最终，通过福建当地媒体的报道和福建省农办的调研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知道了仓苍公社的实践。在福建省农村工作会议上，项南对仓苍公社给予了肯定。

30多年后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福建省德化县采访。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德化县委副书记的邱亚炯向记者提起尤垂镇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这个人在仓苍搞经济有一套。”

“晋江假药案”爆发后，时任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将尤垂镇叫到泉州谈话。

参与撰写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孙长江，在《敬畏人民——项南传》一书的序言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历史背景——

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。项南不推卸责任，带头做检讨，强调要“除虫护花”，采取坚决措施查处“害群之马”……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“沉住气，大胆领导”，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。

33年后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尤垂镇老人的口中再次听到了“除虫护花”四个字。“项南书记说除虫护花，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也泼掉。”尤垂镇说。

张明俊书记担心尤垂镇不肯接这个烫手的山芋，不仅鼓励他，甚至还手把手地交代赴任后怎么开展工作。

当时，晋江领导班子派性斗争很激烈，对“假药案”也有不同态度。越是困难时期，越要团结一致向前看。就任后，尤垂镇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统一县委班子的思想。当时县委一帮人开

会，常常开到凌晨两三点。各方各抒己见后，主持工作的尤垂镇再进行集中。

最后，晋江县委领导班子形成共识，即：正确对待假药案，汲取教训，分清是非，扩大教育面，缩小打击面，帮助广大企业主放下思想包袱，继续支持群众大办企业。

催生晋江县经济活力的“五个允许”（允许群众集资办厂，允许企业雇工，允许股份分红，允许价格随行就市，允许供销人员按业务提成）被保留了下来。

在对工作组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同时，尤垂镇提出建议：如果要处理晋江群众、处理晋江干部，开会时他最好能够参加，并允许发表意见。

“我们更了解当地情况，也知道（假药案）是怎么发生的，能比较客观。”尤垂镇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说。

尤垂镇还主张把案子办成铁案，“证据要确凿，要经得起检验”。有人说他，“头脑坏掉了”，好心劝他“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”。但尤垂镇并不考虑这些，“一旦不实事求是，就糟糕了。”

多年之后，有人告诉尤垂镇，晋江办企业的人多少都有海外关系。如果各乡镇多抓那么一两个人，大家可能都跑出国了。

2017年的晋江市GDP完成1981.50亿元。晋江的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已连续6年居全国第5位，晋江综合经济实力连续24年居福建省县域首位。

“晋江假药案”没有让晋江趴下。晋江一直在发展。“虽然1990年尤垂镇调离了晋江，但说起晋江今天的成就，退休多年的老人难掩自豪之情。”

冒险“放水养鱼”

“晋江假药案”风波刚刚平息，尤垂镇就把精力放到了晋江的发展上。晋江要发展，就必须继续给农民办的乡镇企业松绑。尤垂镇找到当时的泉州税务局局长曾文解，问他敢不敢来晋江搞“带征率”试点。类似的试点两人在南安仓苍曾有过尝试。曾文解笑了笑说，你书记邀请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（下转7版）